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乡村旅游

社区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

——以无锡市鸿山街道大坊桥旅游社区为例

华章 周武忠¹

【摘要】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与社区社会演化是乡村旅游地社会空间变化过程的一体两面。本研究根据空间生产理论中的“三元空间方法论”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过程进行了解析。认为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包括了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实践、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再现以及再现的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生产。现阶段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存在着乡土风貌危机、文化胁迫危机和秩序失衡危机。应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危机需要在物质空间生产上关照乡土化,在文化空间生产上强调文化自觉,在社会空间生产上维护空间协调有序。互利共赢的空间再现过程将为社区空间生产提供观念基础,和谐融洽的再现空间过程将为社区空间生产提供社会基础。

【关键词】乡村社区 空间生产 旅游影响 社会演化 空间治理

一、引言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针政策,特别在 2021 年的一号文件中进一步明确要将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推进包括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振兴在内的乡村全面振兴。旅游由于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高、拉动作用突出的特性,一直被认为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在此背景下,我国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乡村旅游社区。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约 12 万个村庄社区开展乡村旅游,受益覆盖达 700 万农民。这些乡村旅游社区依托现有村落,以本地村民为主,且社区成员受旅游业驱动而相互紧密联系。

乡村旅游社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社区,首先表现在这类乡村社区与景区在地域范围上高度重合。农业生产虽然仍然是乡村旅游社区的重要职责,但是乡村旅游社区还要肩负景区的现代服务功能,甚至伴随社区发展,还要承担起现代居住社区的功能;其次表现在社区社会关系的多样化。多元主体的到来让乡村旅游社区的社会关系经历了瓦解与重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人信任关系通过新的日常交往逐步得以重塑;最后表现为乡村旅游社区价值观念的高度分化。多元主体间不同的成长环境和利益诉求造就了越来越多元的价值观。

由于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机制认识还不充分,致使一些乡村旅游社区发展过程中出现人地关系失调、地方特色与乡村性逐渐丧失、传统文化断层、社区内的利益主体间因利益分配不公矛盾冲突加剧等现象。因此能否正确理解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过程已成为能否落实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在理论研究方面,相关学者尝试从不同视角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进行了分析^[1-5],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¹**作者简介:** 华章,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武忠,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文化景观遗产的文化‘DNA’提取及其景观艺术表达方法研究”(15BG083)与农业农村部软科学研究课题“乡村文化多样性与创意农业推进政策研究”(2018042)阶段性成果。

但基于传统理论和方法的乡村旅游社区发展研究较多从某一角度予以解析,缺乏系统的多角度的综合研究。空间生产理论诞生于社会学“空间转向”的背景,强调研究视角的包容与多元,因此更契合时代发展的背景和理论整合的要求。我国一些学者也对乡村社区空间生产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例如王勇等(2012)考察了苏南乡村空间的转型机制,认为苏南乡村空间转型由三个阶段组成,而空间生产是推动空间转型的关键力量^[6]。朱晓翔等(2020)对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机制进行了探究,认为乡村社区在权力、资本与利益的影响下,构建出了旅游制度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三类空间之间的不断互动,推动了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7]。

乡村旅游社区既是社区居民的生活生产空间,也是游客休闲体验的空间,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空间载体,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重视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相关研究非常必要。因此,本文选取江苏大坊桥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坊桥旅游社区空间演化的解构,尝试为我国复杂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演化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以进一步探究治理和改善乡村旅游社区的对策建议。

二、空间即是社会,社会即是空间:空间生产理论引介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一书中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概念^[8]。列斐伏尔注意到“空间”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外在于现实社会历史进程的“容器”或者社会关系变革的被动载体,而是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的存在,是充溢着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复杂产物。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一切都离不开空间这一物理载体的依托,空间本身就是生产的主角。他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认为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和不平衡事实上已经渗透到现代空间生产之中,最早建立在自然物质、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地理学理论和资本生产规律,已经被社会空间和社会因素分异所取代。

在现代空间生产中,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不平衡性、差异性生产积累的先决条件。当空间生产在横向上通过地理扩张追求自己的异质性生产受挫时,它就会在纵向上生产不平衡和差异;反之亦然。在横向的空间演变上,地理扩张和空间扩展表现为一种不平衡的城市空间拓展格局;在纵向的生产关系上,空间生产通过对人群的分层从内部主动寻求生产差异^[1]。因此,后现代社会中全球性的空间布展和社会不平衡的制造,是空间生产得以存续的重要方式。

列斐伏尔还构建了一套分析空间的方法论。他认为空间具有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重属性,空间实践是指可感知的物质环境;空间的表征指的是概念化和抽象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现实空间。空间生产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对空间进行重塑,因此,空间生产不仅是对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生产,也是对社会关系的生产。

苏贾、哈维、福柯等学者继承和发扬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并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生产理论。例如苏贾主要围绕空间本体论进行理论研究,他一方面认为空间生产具有文本含义、符号象征、宗教信仰等意义,生产过程彰显着人的主体生产实践;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空间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资本空间化的过程,实质就是资本对利益的追寻^[2]。

哈维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化的角度,考察了当代社会空间生产的过程和意义,他认为空间生产与社会生产是社会变化过

^[1]王维艳:《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再生产权能及其空间正义实现路径——地役权视角下的多案例透析》,《人文地理》2018年第5期。

^[2]郭旭、赵琪龙、李广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乡村空间转型——以苏南为例》,《城市规划》2015年第8期。

^[3]于正松、程叶青、李小建等:《工业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演化过程、动因与重构——以河南省曲沟镇为例》,《地理科学》2020年第4期。

^[4]翁一峰、吕斌、鲁晓军:《“产权关系”视角下的乡村空间发展探究——以无锡市阳山镇为例》,《城市规划》2014年第10期。

^[5]郑辽吉:《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分析》,《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10期。

^[6]王勇、李广斌、王传海:《基于空间生产的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及规划应对》,《规划师》2012年第4期。

^[7]朱晓翔、乔家君:《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三元辩证法视角的分析》,《经济地理》2020年第8期。

^[8]〔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2页。

程的一体两面,要构建新的社会形态,就必须构建一个新的“空间”^[3]。福柯则从微观尺度对日常生活实践和规训政治进行理论分析,认为政治权力既是强制性的,同时又是生产性的。国家一方面追求更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又要限制过量的空间生产,这样的平衡最终诱生出了政治空间的生产机制^[4]。

空间是人文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领域,一个区域的经济活动转变或新发展政策的出现,都将牵涉到区域的空间变化。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的实质是一定历史时期内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加速增长及其中伴随的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问题,是空间生产理论在乡村旅游社区领域中的表达。按列斐伏尔空间三重属性的阐释,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包含了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实践、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再现、再现的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生产三部分。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实践是社会活动和交往的行为过程及其创造的社会空间的物质结果。它是一个可以由人的五感进行感知的空间。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实践过程正是乡村旅游社区物质性空间的生产过程,社区居民、外来投资者、政府及游客是乡村空间实践的主体,围绕旅游进行的生产与消费行为构成了空间实践的主要方式。从实践效果上看,各类民居景观、公共建筑和村落人居环境等构成了空间实践的产物,它们依据实践主体的行为特征呈现出相应的状态。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再现是精神性与概念化的空间想象,即把实际可感的乡村物质空间以概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一过程绝大多数的话语权掌握在各种专业领域人士手中,他们通过解译乡村空间实践过程中生成的价值观念来控制乡村空间知识的生产。乡村旅游社区文化就是空间再现的产物,知识官僚、规划师和乡绅通过对价值观念的集体引导、对制度规范的建构和对共同记忆与风俗的培育,实现了文化空间的生产,使得社区得到了较为一致的文化遗产。

乡村旅游社区再现的空间属于生活层面的空间,人通过相关既定的意象、符号以及表征而直接使用外在世界的空间。从内容上看它包含了空间的实践和空间的再现,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但是又不是二者简单的叠加,由于其内部包含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并赋予这些社会关系以合适的场所,因此列斐伏尔又将之称为社会空间。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的生产主体是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人类在群体性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生产关系、权力关系和思想关系等等抽象的意象符号,这些意象符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社会空间。

三、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实践

每一种特定的社会都历史性地生产属于自己的特定空间模式,旅游开发推动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作为社会产物的乡村空间自然也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剧变,本研究试以无锡鸿山街道大坊桥旅游社区为例,论述这一演化过程。

1. 案例地情况简介

大坊桥村位于江苏省无锡市鸿山街道,与苏州隔河相望,是伯渎河最南端的一个历史名村。这里河网纵横、土地肥沃,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同时又是兴盛的水码头,庭院、民宅、店铺等临河而建,空间格局较为紧凑,富有地域特色。大坊桥名称与各种作坊有关,旧时村内有众多作坊,如磨坊、酒坊、豆腐坊等,又有桥连贯东西,因此称为坊桥。大坊桥村共有41个居民组,常住居民4916人,主要以本地村民为主。

案例地的选择主要考虑两个方面:1. 案例地是否具有代表性;2. 对案例地的实证研究是否切实可行。本研究选取大坊桥为案例社区正是基于以上两点的考虑。一方面大坊桥旅游已初具规模。2017年,大坊桥所属鸿山街道立意打造省级无锡鸿山旅游度

³[1]刘畅:《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社区工作关系研究——以J社区环境治理为例》,《社会工作与管理》2016年第6期。

[2](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32页。

[3](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页。

[4](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页。

假区。根据规划,大坊桥全村位于其中,定位为民俗文化体验社区,大坊桥开始步入旅游业快速发展时期。

在这期间,大坊桥先后获得无锡市和谐示范村、无锡市文明村、无锡市村庄整治美丽乡村、无锡市幸福安康示范村居、无锡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称号,并于2020年11月20日被中央文明委评为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社区内旅游从业人员众多。调查发现,全村34.7%的家庭从事乡村旅游或与之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因此具有相当强的典型性。另一方面,课题组在2017年受鸿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委托,进行鸿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因此得以有机会深入案例地社区调查走访,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有助于研究的开展。

2.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实践——作为生活实践场所的物质空间生产

(1) 民居景观生产

民居景观建筑的生产主体是社区居民。受旅游经济的驱动,一方面由于核心家庭有较高的生产自主性,拥有更多的空闲建筑进行旅游接待,因此比传统大家庭在生产经营上更具有竞争力,导致这一时期大坊桥村进入了快速分户的阶段。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决定着社会生活状况,物质生产的提升必然影响社会生活质量的改变,这又表现为居住空间的大幅度扩张和民居建筑形态的改变。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大坊桥掀起了“瓦房变楼房”的热潮。

(2) 公共建筑生产

大坊桥旅游社区中,除了大量的民居景观外,还有丰富多样的公共建筑,它们在村落的社会延续和生活组织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村落的公共建筑按照功能大致分为生产、宗教祭祀、休闲等几大类。旅游开发前的大坊桥社区主要的生计来源是务农,晒场、磨坊和水井是社区内最常见到的生产空间。

村民闲暇娱乐活动较为单一,首选是在家看电视和打扑克牌。逢年过节虽然有走亲访友,但是由于同宗大都在村内留有旧屋,回旧屋过年已成为惯例,因此这一时期闲暇活动范围仍然基本局限于村庄内部。村内有过去遗留下来的戏台,长时间荒废不用,成为邻里日常唠家常的场所。

旅游开发后,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村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显著改变,特别是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社区居民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为闲暇活动买单的意愿高涨,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更有以游客和旅游从业者为代表的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乡村,新的消费空间被不断生产。但是新的消费空间生产是以旧空间的消失为代价的,原因是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只有可以为社区创造出更多的利润与价值的空间才被生产,久而久之传统公共空间产生功能弱化,祭祀和生产的功能逐渐被服务和消费的功能所取代。

(3) 物质空间生产面临的问题

从大坊桥物质空间演化实践看,村庄面临乡土风貌危机和空间正义危机。传统大坊桥居民靠水而生,靠水而作,这就造就了大坊桥建筑空间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特征。许多宅院都在纵横交错的河道旁,村落前后波光粼粼的河道塘面是养鱼的场所。住宅四周种植果树林木,这种景观布局不仅适宜农、林、副、渔活动的展开,形成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呈现出浓郁的江南乡土气息。但是旅游的发展却使得乡土性面临丢失的风险。

空间作为一种商品,一样会受到资本的驱动。当空间在资本逐利性影响下被标准化“生产”出来时,必然会以丧失“感知”多样性为代价,表现为建筑“符号的贫困”。旅游带来了大规模批量造景,使得大坊桥传统乡村意象正在快速消失,新建的乡村集中居住社区与城市社区无异,其乡土性连同人们的记忆一同远逝,进而产生物质空间乡土风貌的“同质化”危机。

3.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再现——作为价值观念载体的文化空间生产

(1) 价值观生产

价值观念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的纽带与黏合剂,是社会变革长期实践的一部分。价值体系构成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范型”,是以一定的形式在社会成员内部传承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劳动分工与私有制的发展,社区居民、游客、基层从业人员和外来投资商等利益主体在日常旅游实践中一定会产生分歧。为了解决矛盾,社会成员需要遵循“适宜性”的价值观念,以调节“小我”与“大我”、“小家”与“大家”的关系。

旅游开发前,大坊桥社区相关利益主体主要由“本地居民”和“村干部”构成。大坊桥村市场经济发达,居民有相当一部分外出打工或从事手工业生产,对集体的依赖性较弱,工具性交往现象日益凸显,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有被边缘化的倾向。旅游开发后,“投资商”和“游客”进入社区,投资商希望得到的是超额的利润;游客希望能够在乡村感受到淳朴的乡风,欣赏到优美的景色^[1]。二者的诉求又影响着政府和居民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博弈的四方最终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让村落发展得更好。

只有这样,四方才有利益可以去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由上级政府新吴区政府成立了吴博园建设有限公司以主导大坊桥社区的开发与经营管理;村两委积极组织农户参与旅游经营,依托原有的民居,把社区建成一个旅游服务基地,让社区农户经营农家宾馆、商铺等,同时鸿山街道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经常性开展道德模范评选,广泛宣传好人好事、善行义举,定期举办道德讲堂,引导群众见贤思齐,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好人、传播正能量的浓厚氛围。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村民的集体意识得到凝聚,个体间的矛盾得以缓和,利益得到较为合理的分配,个人主义逐渐得到遏制,新的义利观逐渐生成。

(2) 制度规范生产

制度规范是价值观的具化,其作用在于规制个体的行为,主要体现在激励行为与约束行为两个方面,目的在于界定权利和义务,同时也能影响利益分配。制度的设计也是旅游社区文化空间生产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将乡村生态价值置于价值体系的最高层面,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为旅游社区居民要逐渐向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遵循。

随后各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对乡村旅游社区建设起到了积极引导的作用。地方制度层面,鸿山街道美丽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宜业发展的美丽乡村,因此出台一系列制度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休闲度假等农村发展优势产业,为广大农民群众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3) 文化记忆与风俗习惯生产

乡村文化记忆与风俗习惯来源于社区居民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的广泛交往,是乡村独特的文化标识,也是乡村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坊桥村一方面组建了村文明办,文明办由村委负责人、乡贤和村民代表组成,设乡贤理事会引导村民对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事务进行民主自治,发挥村民群策自治作用;规范红白喜事办理方式,宣传禁毒禁赌,发挥法治德治作用。大坊桥社区所处鸿山街道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既是泰伯赴吴的落脚之所,也是勾吴文化的发源地,还是汉代梁鸿孟光“举案齐眉”典故的发源地,中原文化与古越文化在此交汇融合。

泰伯与仲雍举贤让国的举动、至善至孝的美德,以及梁鸿孟光夫妻相亲相爱、互敬互助的和美家庭关系一直让后人景仰、广为传颂。因此,在专项规划中,镇政府发动百余名周边乡贤文化骨干组建“大坊桥艺术团”,精心编排各种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项目,弘扬鸿山人文精神。大坊桥社区以民俗文化村的形式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与修缮。

⁴[1]杨梅、陆志勇、张兆福:《传统村落旅游利益分配U型关系研究》,《重庆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4)文化空间生产面临的问题

文化空间生产面临文化胁迫危机。乡村文化容易受到旅游影响而产生文化胁迫效应^[1]。造成文化胁迫效应的原因在于旅游导向下乡村存在收入分层与社会不公等现象,这些不公平不公正现象降低了村落社会的凝聚力。城市文化在外来游客的裹挟下渗入乡村居民的生活中,侵蚀着他们的文化认同与自信,很大可能会破坏当地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致使乡村文化的传承断裂^[2],在一定的时间横截面上呈现出特定的文化胁迫格局和结构^{[3]5}。

4. 再现的乡村旅游社区空间——作为人际联系纽带的社会空间生产

(1)人际关系生产

乡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构成乡村人际关系生产的基础。旅游开发前社区居民构成较为单一,地缘或血缘构成了彼此的纽带。乡村虽然存在着众多产业,但是农业仍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这不光体现为农业所占比重高,更体现在商业、手工、交通、邮电等产业要素均按照一定的秩序围绕农业形成有机组合。

从权力分配上看,少数村干部拥有最重要的话语权而大多数村民服从于村干部,因此个体间地位较为一致。伴随旅游业的发展,居民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收入持续改善,吸引了周边资本和劳动力的涌入,大坊桥村社会关系网络得到拓展。旅游开发加速了乡村产业结构分化进程,不少乡村旅游社区的产业结构依托旅游业逐渐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家庭宾馆、旅游餐饮、旅游交通、文化演艺、旅游商品销售、旅游金融等服务业为主,以农业、工艺品制造业及其他制造业为辅的多元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日趋复杂和多元化。

由于旅游行业与外界接触较多,社区产生了职业的分化,在景点周边可能会自发形成诸多旅游商摊,这部分村民成为商人或旅游服务者,而远离景点的地方可能仍然维持原先农业生产。旅游开发过程中,乡村社会也产生了诸多新的职业角色,大致包括七类:第一类为非旅游业从业者,他们是未能从事旅游业的村民。第二类为兼业从事旅游业者,或者称为短期工,即闲时从事旅游服务业,忙时从事其他行业。第三类为个体摊贩,这类角色的形成无需复杂的技能储备,门槛较低,因此最为普遍与常见。第四类为技工、服务员、保安、清洁工这类普通体力劳动从业人员,这一群体主要来自于乡村旅游社区周边的农民。第五类为个体运输业者,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与生产资料,承担着社区与外界频繁的人员和物资联系。第六类为各类服务业经营者,他们需要拥有一定的资金和较为丰富的旅游从业能力,除了自雇外,有的经营者还会雇佣数量不等的雇工。第七类为村级管理者,即村委会干部或旅游协会管理者,他们需要具备相当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在整个劳动分工体系中人数最少,但话语权最大。

由于居民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因此社区成员参与旅游的方式和程度也存在差异,知识程度较高的中青年男性村民主要从事家庭宾馆经营、工艺品加工制造;知识程度较低的中老年人主要在旅游交通、工艺品和土特产销售领域工作;中青年女性的工作则以餐饮民族文化演艺、工艺品和纪念品销售为主^[1]。经营能力和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成为评价个人能力的主要标准,普通家庭拥有了一条新的向上流动的道路,并由此加速推动新兴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的形成。这个新兴阶层以旅游个体经营者和私营旅游企业主为代表,权力结构也表现出新的结构特征,新型的富裕农户成为人们争相交往的新势力,逐渐成为与传统地方政治精英相制衡的社会控制力量。

(2)人际信任生产

⁵[1]吴丽敏、黄震方、谈志娟等:《江南文化古镇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及其形成机理——以同里为例》,《人文地理》2015年第4期。

[2]黄震方、陆林、苏勤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地理研究》2015年第8期。

[3]徐冬、黄震方、洪学婷等:《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研究——以苏州东山镇为例》,《地理研究》2020年第10期。

旅游发展使乡村社区内出现了政府、旅游者、外来开发商等新的外来者，居民与外来者会通过空间实践和生产关系等形成一种新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复杂性在人际信任层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信任中心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中，人们被禁锢在某个特定的“圈子”中，血缘关系离“己”越近，信任感越强。而在旅游经济影响下，利益成为影响信任格局的重要因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伦理关系在信任格局中的重要性和比例明显下降。第二，普遍信任成为主流。由于乡村社区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月艮务型社区，因此在新的信任格局中，日常交往中基于血缘的特殊信任逐渐解体，特殊信任逐渐被纯粹的理性的普遍信任所取代。第三，信任分布不均衡。旅游影响下乡村人际关系网络扩大，在姻亲、邻里、同学等“圈子”外还存在各种新式交往圈，联系交往较多群体之间信任培育较快，反之则群体间信任水平较低，社会信任极化现象显现^[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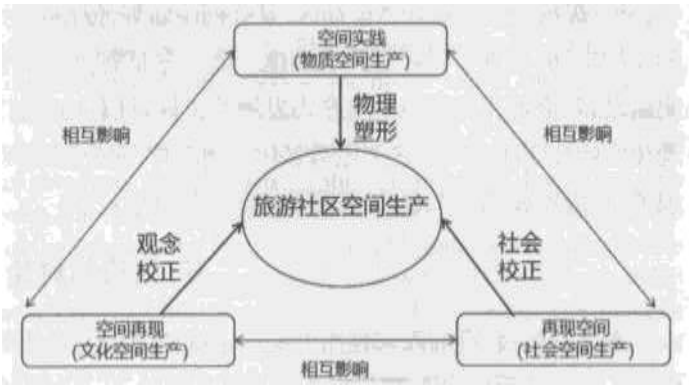
(3) 社会空间生产面临的问题

社会空间生产面临秩序失衡危机。空间秩序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人际关系网络的失衡。旅游经济的逐利性导致东道主社区内部的交往分化^{[3]6}，人们只倾向于与自己有利益来往的群体交往，而忽视了对于弱关系的维护，长此以往造成交往极化。其二体现为人际信任的缺失。乡村旅游虽然有助于培育信任，但是仅限于培育因旅游产生交往的群体之间的信任，对于不涉及旅游交往的群体，其正向影响仍然相对有限。同时，旅游的逐利性和不同文化间的隔阂也会造成失信现象，例如旅游主客体间的失信、旅游从业者间的失信、旅游从业人员与非从业人员间的失信等。普遍的失信会造成违规行为成本过低，进一步加剧信任分布极化，最终导致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和社会空间非正义化的出现。

四、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的治理

治理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的多重危机，关键是在空间生产的关键环节上不断调整创新。在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过程中，协调有序的空间实践为社区空间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多元主体依据日常旅游生产消费习惯创造了富有特色的物质空间形态，并为乡村旅游社区的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提供了发生的场所；互利共赢的空间再现过程为社区空间生产提供了观念基础，多元主体通过旅游活动

达成文化理念的统一，最终体现为文化观念上的规范化与普适化，并为乡村旅游社区的空间实践和再现空间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谐融洽的再现空间过程为社区空间生产提供了社会基础，多元主体在交往中构筑人际关系网络，培育了相互间的信任，营造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并为乡村旅游社区的空间实践和空间再现提供了赖以发生的社会土壤（见图 1）。由此提出如下治理建议。



^[1]饶勇：《分工演进、文化差异与少数民族社区的旅游经济发展——基于海南三亚回族村与六盘黎族村的经济社会学分析》，《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2]席建超、王新歌、孔钦钦等：《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地理研究》2014年第10期。
^[3]孟威、苏勤：《历史城镇类旅游地居民交往偏好分化及测度——以周庄为例》，《旅游学刊》2009年第5期。

图 1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治理路径

1. 物质空间生产需关照空间乡土化与维护空间正义

对于新的空间生产主体——游客来说,乡村性和地方特色是吸引他们到来的独特卖点,民居建筑的风格、风貌、色彩和形态可彰显其独特魅力,成为游客选择乡村旅游地时的重要参考因素^[1]。乡村乡土特性是地形、气候和建筑技术、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产物,因此实现乡村乡土化要针对不同区域环境采用不同营建方法。以大坊桥为例,在乡村传统环境改造中要加深对大坊桥社区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通过营造敞厅、天井、粉墙、黛瓦、通廊、码头、河房等传统景观元素体现传统风貌,通过复现传统建筑格局体现建筑秩序;在田园景观区进行边界保护,通过设置适当的空间尺度,体现大坊桥社区江南原乡的农业生产面貌;在新农村风貌区合理借鉴城市文化,创新、创造新环境元素,展现社区充满活力的现代风貌。维护空间正义是实现物质空间协调有序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要规范资本在乡村空间生产中的逐利行为,同时政府要保持中立角色,减少与资本的同盟,由政府、中介组织、公众和社会团体在共赢的心态下,通过协商谈判形成良好分工和发展共识,共同制定出资源分配规则,最终形成共赢的局面,维护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空间生产的权利,保证空间正义。

2. 文化空间生产需强调空间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即让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知道其文化将何去何从。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于 1997 年提出的,现已成为学界与业界的共识。文化自觉的关键是培育文化自主性,即尊重个体独立的人格,对个体应有的价值予以认可,将不断地拓展人的自由空间作为终极的人文关怀。这就需要政府从培养社区居民的文化自主性出发,对社区居民进行文化启蒙。大坊桥社区及其周边有丰富的历史典故,如表现高风亮节的泰伯让国,表现夫妻和睦的举案齐眉,表现凄美爱情的西施三叹等。通过举办节会,宣传自身的文化,让社区居民知道自己社区的文化根源,知道自身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可以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抉择。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尊重社区居民自主选择的权利,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推动乡村空间自下而上的治理。

3. 社会空间生产需维护空间有序

发展乡村旅游对于乡村社区来说并非仅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要构建有序的空间秩序,推动实现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乡村善治模式,因此在社会空间生产中维护空间秩序就显得十分必要。维护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秩序一方面需要从建立社会连接入手,通过保留大坊桥社区的传统交往空间如宗祠和大院等,营建新交往空间如村民活动室、社区服务中心、旅游集散中心、生活广场等,开发虚拟交往空间如微信社区、互联网论坛等,促使乡村交往空间由单一的聚集空间,分化为多样的交流空间,促进乡村社会网络构建。另一方面需要从规范社会交往入手。社会交往活动是一种历史活动,其合理化构建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只有物质财富的丰富才能减弱交往的负效应,实现合理化的社会交往。同时社区还需强化道德教育,充分利用舆论,开展对社区内先进典型和模范的宣传报道,积极发挥先进人物、优秀群体的示范带动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社会-空间互动视角出发,以空间生产理论为逻辑对旅游影响下的乡村社区空间演化过程进行了特征分析和治理途径探讨,得到如下结论:1. 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包括了旅游社区空间的实践、旅游社区空间的再现以及再现的旅游社区空间的生产。空间生产及其三元辩证法强调对不同空间的联系与影响的分析,可较好地探讨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的内在逻辑问题,并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2. 现阶段大坊桥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存在着乡土风貌危机、空间正义危机、文化胁迫危机和秩序失衡危机。造成乡土风貌危机和空间正义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造成文化胁迫危机的原因在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侵蚀影响;造成秩序失衡危机的原因在于交往极化现象和交往过程中的失信行为。3. 应对大坊桥乡村旅游社区空间危机的办法在于物

^[1]朱晓翔、乔家君:《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三元辩证法视角的分析》,《经济地理》2020 年第 8 期。

质空间生产上需要关照乡土化和维护空间正义，文化空间生产上需要强调地方文化自觉，社会空间生产上需要维护空间协调有序。

本文对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与治理做出了理论分析，但是仍然存在值得探讨的地方。例如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仍然是一对有待探究和完善的概念，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并非完全二元对立，仍然有着某些联系。因此在后续研究时，笔者会进一步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以增加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适应性。此外，本研究主要以质性方法对乡村旅游社区的空间演化和治理进行了分析，在量化分析方面的缺乏是本研究的不足，将乡村旅游社区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用较多指标进行量化分析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